

柬埔寨的國家認同——榮耀與傷痛的連動

紀舜傑

淡江大學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副教授

摘要

柬埔寨的國家形象經常與吳哥文明的榮耀，與赤柬恐怖統治的對比。本文以原生論與建構論之脈絡檢驗柬埔寨國家認同之要素與議題。我們發現柬埔寨的國家認同涉及了歷史、文化、社會和政治等多個領域，反映了長期與周邊社會交流和互動的歷史結果，特別是印度和東南亞其他國家文化對柬埔寨語言、宗教、藝術和建築等的影響，以及法國殖民主義和之後赤柬政權對柬埔寨身份認同都有深遠的影響。赤柬的恐怖統治摧毀所有文化傳承的媒介與機制，讓進入全球化時代的柬埔寨重新建構國家認同的要素。專制政權與貪汙腐敗仍是嚴峻的挑戰。

關鍵詞：吳哥文明、赤柬、佛教民族主義

壹、前言

柬埔寨有著兩個強烈顯明對比的國家形象，一個是榮耀的吳哥文明，一個是赤柬 (Khmer Rouge) 殘酷的統治政權。當下，吳哥窟 (Angkor Wat) 已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認定是人類最重要的世界遺跡之一 (Kozymka, 2014)，另一方面，赤柬及其主要領導人波布 (Pol Pot) 的名字幾乎已成為大規模系統性殘殺和恐怖統治的代名詞 (Taylor, 2014)。

柬埔寨位於中南半島，與寮國、泰國、越南為鄰，其南部隔暹羅灣與馬來西亞相望。土地雖然為丘陵與山脈環繞，但由湄公河及其支流沖積而成的四分之三以上土地，是肥沃的農業地，因此自古都是農業發達。人口約 1,700 萬，宗教與族群的分佈為：信仰上座部佛教 (小乘佛教) 占總人口之 90%，佔比約 1% 的華裔則信仰大乘佛教，越南裔大多數是天主教徒，占族與馬來人則多信奉伊斯蘭教，伊斯蘭教人口約有 40 萬人 (中華民國外交部，2023)。

柬埔寨與台灣的關係有著高低起伏的歷史，柬埔寨於 1953 年 11 月獨立建國後，與台灣建立官方的領事關係，施亞努國王 (Norodom Sihanouk) 也曾於 1955 年底訪問台灣。但施亞努與共產陣營友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係密切，並與毛澤東有良好關係，在 1958 年 7 月，柬埔寨便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與中華民國政府終止外交關係。隨著越戰的局勢發展，1970 年親美反共的龍諾 (Lon Nol) 將軍政變上台後，與中國斷交，恢復與中華民國的官方接觸，曾設有駐華代表團。延續這股友好氣氛，1971 年聯合國表決『聯合國大會 2758 號決議』時，柬埔寨與菲律賓是東南亞僅有的投下反對票的國家。

赤柬上台後，龍諾政權瓦解，也結束了台柬兩國的實質關係。1993 年在聯合國主導下舉辦首次大選，洪森 (Hun Sen) 掌控政權，但是由施亞努次子拉那列 (Norodom Ranariddh) 出任總理，與洪森成為政敵。拉那列與台灣改善關係，響應李登輝總統的南向政策，兩國在 1995 年互設辦事處，開通直飛航班，台商也隨之進入柬埔寨投資。但是後來爆發武裝政變，洪

森徹底擊垮拉那列的勢力，洪森撤除台灣代表處，取消兩國直航，變成東南亞最親中反台的國家。近年來因為台灣年輕人被誘騙至柬埔寨和緬甸從事詐騙工作，在台灣引起高度關切，柬埔寨甚至在台灣媒體上變成詐騙虐待的代名詞（林仕祥，2022）。

討論國家認同之前通常會先檢視民族主義，我們認知國家認同的所有概念都有界線，界定團體內外的成員，內部成員是所謂的「我者」（self），外部成員即為「他者」（others）。民族主義界定這些界線與身分定義，差別在這些界線是包容還是排他，以民族文化為基礎是較具排他性國家認同（ethnic nationalism），這種原生論以共同的祖先、出生地的限制、種族、宗教，或是語言等民族文化為認同的基礎，這些標準客觀存在，個人沒有選擇的自由，這屬於是非題，而不是個人意願的選擇題。Smith（1991）認定國家認同背後的民族主義是具有民族象徵性（ethnosymbolism），這些民族象徵性包含民族名稱、共同祖先、共用的歷史記憶、以及共同的故土，其中民族文化是最重要的凝聚力，而且對民族歷史的共同記憶是整個民族一脈相傳的薪火，因此民族是一群具有特定名稱，佔領固有領土，分享共同的神話和歷史記憶，形成一個大眾文化，共同經營經濟發展與政治制度（Smith, 1991）。所以，民族主義的形成不是主觀的認定或想像。

與原生論相對的是建構論，這種偏向公民認同的標準較具包容性（civic nationalism），且屬主觀認定。Anderson（1983）認為民族不完全是血緣關係的結合，而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民族的認同都是經過想像、塑造、或是捏造出來的。國家認同則是透過在歷史、語言、意識形態、和權力的交叉作用的想像建構而成。不同的文化群體在這個建構的過程中，可能因為競爭而造成國家認同的爭議。這些競爭也都涉及「敘事」（narrative）的目的，可能是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的動員所需（Groves, 2014）。¹

本文重點在檢視柬埔寨的國家認同議題，多年來書寫研究各國的國家認同，我已經習慣找出一般性的認同要素，例如血緣、民族、語言、宗教

¹ 以上理論架構改寫自紀舜傑（2021、2022）。

等原生條件，同時也要檢視歷史、制度、社會結構等建構要素。除了找出各國的認同內涵外，也能發掘許多特有的國家特色與性格，充分領略世界多元性的美妙與精采。本文主要希望以上述原生論與建構論的脈絡，檢視柬埔寨的國家認同議題，特別是法國殖民、吳哥文明、族群（高棉族為主）、宗教（佛教民族主義）、以及赤柬政府與全球化在國家建制與民族形塑上的角色。

貳、柬埔寨的歷史脈絡

我們參考專研柬埔寨的學者 David Chandler (2007) 以三個要素來看柬埔寨在認同上的發展，分別是地理位置、領導權力的傳統形式、與集體記憶。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與發展息息相關，我們常說「歷史創造地理，地理製造歷史」，柬埔寨位於泰國和越南之間，人口相對較少，不過，擁有豐富的沖積土和淡水漁場，容易受到外來影響和入侵者的誘惑。15 世紀初高棉帝國垮台後，柬埔寨的領土被鄰國瓜分，直到 1864 年成為法國的保護國。1953 年獲得獨立建國後，享受 15 年的脆弱和平，受到長久以來紛爭不斷的鄰國騷擾，以及整個東南亞在冷戰時期的地緣衝突，泰國和南越與美國結盟，而柬埔寨的施哈努試圖保持中立。但是局勢的發展讓中立很難維持，在美國、蘇聯、中國與越南的權力競逐中，柬埔寨還是被捲入地緣政治的衝突中。

在柬埔寨的權力領導傳統方面，則是習慣定於一尊的崇高獨一的領導地位。柬埔寨沒有領導人之間分享權力的傳統，也不容忍政治反對派。從吳哥王國開始的政治體系就是高度集權，國王擁有絕對權力，被視為神聖和絕對權力的象徵。到法國殖民統治期間禁止權力挑戰，再到獨立後由單一領導人握有絕對的權力，這傳統一直延續到今天。現任首相洪森自 1998 年上任以來，是全球掌權最久的領導人之一，一直試圖通過鞏固權力、削弱反對派、加強對公民社會的控制以及利用國際援助來增強其合法性來主導政治。柬埔寨人對皇室的態度，以及對任何當權者的態度都是認為領導人的全是來自前世功德的累積，當權者享有權力是天經地義的事。

再來是對歷史的記憶與看法是塑造柬埔寨另一個主要因素。從 10 世紀到 14 世紀，高棉王國統治著東南亞，其影響遍及今天的泰國、越南和寮國的大部分地區。吳哥是王國鼎盛時期的首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前工業化城市中心，它見證了古代高棉王國的巨大影響力、財富和文化成熟度。但是這段光榮歷史隨著王國的衰敗便逐漸失傳，直到殖民時代，法國學者們發現了中世紀的高棉寺廟並翻譯了它們的銘文，帶給柬埔寨人一個嶄新的歷史認識，即他們的祖先是東南亞最有天賦和最有權勢的人。這種觀念導致柬埔寨人認同吳哥文明，並渴望恢復當時的強盛。

延續這三個脈絡，我們也可以用吳哥文明、法國殖民、佛教民族主義、赤柬統治、以及後赤柬的全球化影響，來更細部地分析柬埔寨的國家認同基礎與要素。

參、吳哥文明的影響

我們所稱的吳哥文明，指的是西元 9 到 15 世紀間，建立在今日柬埔寨境內的吳哥王國，又稱高棉帝國。吳哥王國以其壯麗的建築和文化成就而聞名於世，被譽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古代文明之一。吳哥王國的建立可以追溯到西元 802 年，由闍耶跋摩二世（Jayavarman II）國王統一了柬埔寨地區的諸侯國，建立了吳哥王國。然而，真正使吳哥王國達到巔峰的是在 12 至 13 世紀期間的吳哥王朝，尤其是在闍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VII）統治時期。

吳哥王國的最大成就之一是其壯觀的建築群，其中最著名的是吳哥窟，也是吳哥王國最重要的象徵之一。它的建築風格結合了印度教和佛教元素，展現了當時吳哥王國的文化和宗教多元性。除了吳哥窟之外，吳哥王國還擁有眾多其他令人驚嘆的建築，如巴戎寺（Bayon Temple）和塔布龍寺（Ta Prohm Temple）。它們反映了當時吳哥王國的藝術和建築成就，並成為後世建築師和藝術家的靈感來源。

吳哥王國的偉大還展現在其社會組織和基礎設施的發展上。先進的農業系統維持龐大的農業生產，使其能夠維持大規模的人口和軍隊。特別是

農業最重要的水利工程，包括水庫、灌溉系統和運河，都是高度發展才能確保糧食供應和整體的繁榮。吳哥王國在其最鼎盛時期的領土涵蓋範圍廣大，包括現今柬埔寨、泰國、寮國和越南的部分地區。這使得吳哥王國成為當時東南亞最強大的帝國之一。

吳哥王國在政治、文化和經濟方面的強大影響力也吸引了來自不同地區的貿易和外交關係。這使得吳哥王國成為當時的文化交流中心，吸納了印度教、佛教和高棉民族自身的文化元素，形成了獨特而多元的文化遺產。至 14 世紀後期，吳哥王國面臨了內部政治衝突和外來勢力的威脅而逐漸衰敗。王國陷入了動盪和分裂，國力消退，最終在 15 世紀初，吳哥王國被泰國的暹羅王國征服。

吳哥王國的光榮歷史並沒有被流傳，當時唯一的詳實記錄只有元朝的周達觀曾於 1295 年出使柬埔寨（真臘國），在吳哥城居留一年後寫下《真臘風土記》（維基百科，2023a）。周達觀非常詳細描繪介紹吳哥王朝的文化與民俗風情。這本書直到 1819 年才被翻譯成法文，但是並未引起很大的關注。直到 1861 年法國生物學家穆奧（Henri Mouhot）無意中在原始森林中發現這些古蹟，他將重新發現的吳哥窟記錄後由其家人出版為《暹羅柬埔寨寮國諸王國旅行記》，讓世人得以一窺吳哥王國的古廟遺跡。

柬埔寨人也因為吳哥王國的偉大遺跡被發現，重拾起民族光榮感。現代柬埔寨也從古代吳哥王國繼承此項重要的文化遺產，將其建構為民族和文化的政治圖騰，是想像的共同體的依據。即使赤柬波布想重建柬埔寨，而大規模消滅柬埔寨的傳統文化，但是對吳哥文明仍是十分推崇，他宣稱如果我們高棉人能蓋起吳哥窟，我們當然能夠完成任何事（Chandler, 2007）。1992 年 12 月 14 日，吳哥被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UNESCO, 1992）。

吳哥文明被公認為具有突出的普世價值的文化遺產對柬埔寨來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柬埔寨人將吳哥文明當成是民族主義中驕傲的源泉，是經過赤棉摧殘之後，重建這個國家最強大的國際形象的手段，因為它代表著柬埔寨傳統軍事和經濟實力、宗教和文化的繁盛、民族純潔和高尚的藝術實力。吳哥文明也為柬埔寨人提供了一種與歷史和解的方式，柬埔寨『1993 年憲法』揭示是「國家、宗教、國王」三位一體，其中吳哥是這三

者的縮影，也是柬埔寨對外展示的驕傲形象。所以從 19 世紀以來，特別是獨立之後，柬埔寨的所有國旗上都出現了吳哥窟的形象，這是唯一將文化遺產印在國旗上的國家（圖 1）。

國 旗	國 家	使 用
	古代柬埔寨王國	1863 以前
	柬埔寨保護國	1863-1948
	法屬印度支那	1887-1942
	日佔柬埔寨	1942-45
	法屬印度支那	1945-53
	法屬印度支那柬埔寨王國	1948-53
	柬埔寨王國	1953-70
	高棉共和國	1970-75
	柬埔寨王國民族團結政府	1975-76

	柬埔寨	1975-76
	民主柬埔寨	1976-79
	民主柬埔寨聯合政府	1982-92
	柬埔寨人民共和國	1979-89
	柬埔寨國	1989-90
	柬埔寨國	1990-92
	聯柬權力機構	1992-93
	柬埔寨王國	1993-

來源：維基百科 (2023b)。

圖 1：各時期柬埔寨的代表旗幟

肆、法國殖民的影響

柬埔寨在 19 世紀時受到鄰國的威脅與騷擾，安東國王 (Ang Duang) 因為曾經被留置在泰國當人質，他也深刻感受到越南對柬埔寨的覬覦，儘管對這兩國的敵意非常不滿，然而自身實力的差距讓他無法與之對抗，於

是尋求新的外援，特別對法國的國力印象深刻，便開始建立與拿破崙三世的聯繫，並希望法國協助柬埔寨奪回被暹羅佔領的領土。安東在 1860 年去世後由王子諾羅敦（Norodom）接任，他的登基典禮由泰國跟法國人共同控制辦理，也是法國人勢力超越泰國的開始（Chandler, 2007）。Chandler（2007）概述了柬埔寨在法國殖民時期的三個階段。這些階段突顯了法國在殖民時期對柬埔寨控制和政策的演變。

一、建立與鞏固階段（1863-1904）

這個初始階段始於 1863 年簽署的『法柬條約』，柬埔寨成爲法國的保護國。在這個時期，法國致力於建立其權威並鞏固對柬埔寨的控制。法國控制柬埔寨的行政、財政和司法，並派遣行政官員和軍事人員到柬埔寨監督各個層面。同時，法國對柬埔寨人進行經濟剝削，特別是在強迫勞動和徵稅上面。

二、融合與同化階段（1904-39）

在這第二個階段中，法國希望更密切地將柬埔寨納入法屬印度支那，該地區還包括越南和寮國。這一時期法國的政策重點放在現代化和基礎設施建設上。法國引進一系列改革，如法律體系的建構、教育的現代化以及鐵路和基礎設施項目的建設。法國殖民政府希望藉由法式教育將柬埔寨的菁英階層同化，創造出一群受過西方教育的柬埔寨人，他們通常被視爲法國和當地人民之間的仲介者。

三、民族主義興起和爭取獨立階段（1939-53）

第三個階段與柬埔寨境內民族主義和反殖民運動的興起同步。隨著 20 世紀的進展，柬埔寨的知識分子、學生和政治領袖越來越受到全球民族主義思想和運動的影響。柬埔寨的民族主義通常通過政黨、新聞媒體和社會組織表達，挑戰法國殖民統治並要求更大的自主權。諸如施哈努和孫哥清（Son Ngoc Thanh）等人物的出現展現了這種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情緒。最終，柬埔寨於 1953 年 11 月 9 日獨立，標誌著法國殖民統治的終結。

柬埔寨與越南同樣都在 19 世紀被法國殖民，但法國的殖民手段與目標則有所不同，越南有著長久的中央集權和官僚組織的傳統，這使得法國更容易建立直接統治並引進現代化的政策，並創建一個忠於殖民政府的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法國爲了開發越南的自然資源，引進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如鐵路、電報線和現代港口。這種現代化帶來了一些經濟增長，但也造成了社會和經濟不平等，導致了廣泛的反抗法國統治的運動。

因爲柬埔寨的政治格局極爲分散，國家官僚機構非常薄弱，這使得法國更難控制該國並實現現代化治理，於是法國實行了間接統治政策，允許當地精英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治和對自己事務的控制。因此，柬埔寨基本上與殖民政府的現代化影響隔絕開來，這限制了該國的發展。這也奠定柬埔寨的身分政治上，社會階級與資源分配的差異根源。

此外，越南和柬埔寨的不同經濟結構也影響獨立後的發展。越南擁有更爲多元化的經濟，農業、工業和服務業，有比較均衡與豐富的生產總值。但是柬埔寨一直是依賴農業，特別是稻米生產。這意味著越南在獨立後建立更爲穩健的經濟基礎，而柬埔寨則面臨更大的挑戰，需要在經濟多元化和新產業創造方面做出努力。

法國的殖民雖然提供吳哥文明的輝煌歷史記憶，做爲民族主義的一項凝聚力量，但是法國沒有引進普遍的學校教育，陳柔縉（2014）在評論此殖民政策時與日本的殖民相比，日本殖民台灣體會到義務教育基礎教育的重要所以台灣人普遍要上學，日本老師也會到家裡來跟家長說要讓小孩子上學，法國在柬埔寨根本就不重視柬埔寨人的教育，也沒有因爲要提升殖民地的水準而推廣教育。這在身份認同上製造了柬埔寨上層菁英與市井小民之間的階級隔閡。

伍、赤柬的破壞

如前所述，柬埔寨的榮耀與殘酷的對比形象，分別來自驕傲的吳哥文明與赤柬的革命。赤柬的崛起，有其國際共產主義發展的脈絡，因此與中國和蘇聯，甚至是越南的共產黨都有連帶關係。中國支援赤柬的原因主要

原因在於著眼赤柬可以成爲對抗蘇聯在東南亞影響力的盟友，再者中國長期以來對越南懷有敵意，而赤柬是越南的敵對勢力，因此加以拉攏。

另一方面，美國在越戰的戰線拉到柬埔寨，因爲要追擊越共，美國在 1969 至 1973 年間在柬埔寨進行轟炸，這些轟炸行動造成估計有 15 萬柬埔寨平民死亡，造成嚴重的民族創傷感，也是導致柬埔寨政府動盪、以及赤柬得以於 1975 年上台的重要因素（Shawcross, 2002; Clymer, 2004; Taylor, 2014）。而且強化柬埔寨對外國勢力的反感，這種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

赤柬是在 1960 年代初期成立，在龍諾推翻施亞努之後，赤柬開始與施亞努合作對抗親美的農諾政府。美國撤離越南後，赤柬在越共以及中國的協助下，於 1975 年 4 月 17 日占領首都金邊，成立了柬埔寨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Kampuchea, DK）。

波布掌權後，將種族和文化純潔信仰與極端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主義結合起來。很快開始尋求淨化柬埔寨，並使柬埔寨回到因西方影響而失去的想像中的輝煌歲月。赤柬認定新的純正柬埔寨文明必須從西方塑造的城市中撤出，進入農村中心地帶才能建立，農村中心地帶是過去強大的吳哥農業帝國基礎的關鍵。純淨的柬埔寨人是農村的人，居住在城市的人都是受到西方和外來勢力污染的人，這些新人被迫在農田上工作並改造，甚至是淪爲囚犯遭受酷刑，或被殺害（Ebrahim, 2015）。

波布也學習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大規模動員和創建基層組織來強制執行其意識形態。以其進行柬埔寨零年（Year Zero）的概念，意圖消除所有過去的痕跡，從頭開始，這與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創建一個新的、革命的社會，拒絕傳統的價值觀和制度。兩個共產黨政權都認爲自己是全球革命運動的一部分，旨在推翻舊秩序，創建新社會（Chandler, 2007）。因此，赤柬政權進行了一系列社會政治變革，重塑了柬埔寨社會的結構。這些變革包括廢除私有財產，強制將城市居民遷往農村地區，並建立集體農場和勞改營。這些變革破壞了傳統的社會結構，並創造了新的權力動態。更嚴重的影響是造成超過 170 萬人的死亡，包含飢餓、過勞、疾病、與直接殺害（United Nations, 2022）。

Chandler（2007）認爲所有政權的政策不僅是意識形態或政治理論的結

果，還受到歷史、文化和經濟等因素的影響，因此理解這些因素才能較全面性看出真正的原因。波布模仿他的革命偶像進行更激烈的共產社會改造，除了意識形態與政治理論的驅動外，整體柬埔寨人心中歷史文化因素，也是重要的推力。

Hinton (1998) 提出柬埔寨人面子和榮譽 (face and honor) 的文化模型，被用來合理化對那些被認為威脅到共產黨的權威，或未能符合其意識形態的人施加暴力。在柬埔寨文化中，面子和榮譽強調維護個人聲譽的重要性，避免受辱，並為保衛榮譽而不惜一切代價。他們也高度重視對自己的團體或社區的忠誠，及全心全力地效忠與信任「安卡」(組織) 和其領導人。這些文化模型被赤柬政權用來在其幹部中營造一種義務感，即不惜一切代價保衛黨和其領導人的榮譽。通過將這些文化模型與共產黨意識形態相結合，赤柬創造出一種情境，使大規模暴力行為可以被合理化和證明為保衛黨的榮譽而必要。特別是純正的柬埔寨人，是那些來自農村的無產階級，都曾受過富人和政府官員的歧視，所以有面子與尊嚴受損的問題，赤柬上台後的改造是面子與榮譽的復仇報復。

在赤柬的高壓統治甚至是種族滅絕後，在認同上造成相當的危機，因為大部分知識分子、教師、作家和藝術家都受到迫害甚至是殺害，柬埔寨人民幾乎失去集體記憶和文化傳播機制。過往柬埔寨文化遺產的很大一部分傳統上依賴口頭傳播。然而文化和歷史傳播的菁英們遭消滅後，使創傷後文化重建極為困難。赤柬打破了社會和家庭規範，互助合作的傳統被彼此間的不信任與猜疑破壞殆盡。在種族滅絕期間活著的柬埔寨人不想挖掘過去，因為它會激起太多痛苦的回憶。集體沉默已經成為柬埔寨社區的特徵，他們不與年輕一代分享他們的故事。種族滅絕後出生的人幾乎對自己的過去一無所知，洪森政權進一步強化了社會和父母對沉默的強調 (Downie & Kingsbury, 2001)。

另外赤柬也烙下遭受嚴重心理創傷的柬埔寨人身份認同，柬埔寨的名字成為一個仍在面對 1975 年至 1979 年赤柬統治的可怕後果的國家的代名詞，加上後續政府缺乏必要的和解和復原的努力，使得創傷代代相傳，需要加以解決，以促進柬埔寨社會的穩定發展。只有承認關於柬埔寨歷史的

民族真相並適當地追求社會和解努力，柬埔寨人才更有可能獲得心靈救贖並重塑他們的身份（Ebrahim, 2015）。

陸、佛教民族主義

所謂的佛教民族主義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旨在通過推廣佛教的利益和價值，促進民族團結和認同。它在亞洲的幾個國家，包括緬甸、泰國和柬埔寨都是一個重要的力量（紀舜傑，2021、2022）。在柬埔寨，佛教民族主義與認同和歷史密切相關。佛教是塑造柬埔寨的價值觀和信仰最重要的力量，是在逆境中保持堅韌和力量的源泉。傳統上，佛教構成柬埔寨的道德和倫理體系，對保護柬埔寨的民族和文化極為重要。

佛教對柬埔寨的教育也有著深遠的影響，許多學校都是由佛教寺院或僧侶主導和管理的，而學生在進入學校之前通常需要接受佛教的教育和儀式。此外，在柬埔寨的教育體系中，學生也通常會學習佛教和柬埔寨文化的歷史和價值觀。對於許多柬埔寨人來說，佛教教育是他們成長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幫助他們建立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然而，在赤柬廢除佛教之後，信任、尊嚴甚至道德價值都被徹底摧毀（Downie & Kingsbury, 2001）。

然而，由於佛教教育的主導地位，某些非佛教徒可能會感到被邊緣化或排斥在某些學術和教育機會之外。佛教民族主義的興起可能會被用來促進排外、不容忍和對少數群體的歧視。例如佛教民族主義者曾經破壞了柬埔寨境內的伊斯蘭教寺廟和墓地，並將這些地方轉化為佛教寺廟。這些行為導致了伊斯蘭教徒和其他宗教信仰者的不滿和反感。在柬埔寨，政府規定所有宗教組織必須在註冊時提供詳細的資料，包括宗教領袖的照片、活動日曆和地點等資訊。但是，在柬埔寨的實際操作中，只有佛教組織得到了政府的支援和承認。其他宗教組織很難得到政府的批准，甚至在某些情況下被禁止進行宗教活動。對非佛教徒也是為異教徒，這種排斥行為延伸到非佛教徒在工作場所和社會生活中面臨歧視和排斥。儘管如此，洪森宣稱「柬埔寨一直堅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雖然柬埔寨人民信仰多個宗教，

但是柬埔寨從未發生宗教糾紛或分歧。」(東華日報, 2019)

柬埔寨的佛教民族主義也與緬甸一樣地與族群認同相結合, 就像緬甸的緬族是最多數的佛教徒, 主導強勢的緬族佛教民族主義(紀舜傑, 2022), 柬埔寨的最大族群高棉族也是主要的佛教徒信眾。高棉族認同的關鍵元素除了是佛教之外, 也包括高棉語, 這是柬埔寨的官方語言, 具有豐富的文學和文化傳統。而佛教的對高棉社會和文化產生深刻的影響, 最令柬埔寨人驕傲的吳哥文明也是建立在佛教上。

柒、全球化重建時代的發展

20 世紀 90 年代風起雲湧的全球化, 對全世界國家的發展和認同都有深遠的影響, 柬埔寨也不例外。90 年代初, 柬埔寨恢復主權, 進入議會民主和君主立憲時代, 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現在國際舞台上。就像『1993 年憲法』所揭示柬埔寨的新氣象 (WIPO, n.d.):

我們, 柬埔寨人民, 是一個優秀的文明, 一個繁榮昌盛的民族, 一個鑽石般閃耀的崇高威望, 在過去的 20 年裡衰落得很慘烈, 歷經磨難和摧殘, 被削弱得厲害, 一覺醒後堅決團結起來, 決心團結一致, 鞏固民族團結, 維護和捍衛柬埔寨的領土和寶貴的主權, 捍衛吳哥的優良文明, 恢復柬埔寨成為「和平之島」基於多黨自由民主對國家走向永久進步、發展、繁榮和輝煌的未來命運的責任, 憑著這份堅定的意志, 我們將以下內容列為柬埔寨王國憲法。

新國家成立後所面對的是, 基礎設施遭到破壞、人力資本缺乏、經濟發展落後和政治體系的破碎, 是個重建國家機構的艱困任務。國際社會在這項艱困任務中發揮關鍵作用, 提供基礎建設和人力資源培訓的廣泛援助。包括日本、美國、法國、澳洲和瑞典等國, 聯合國及其機構、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 與各種非政府組織都投入援助。

然而, 柬埔寨政府的貪汙腐敗與政治的不安定, 讓重建計畫面臨困難, 而且外援可能帶來更多的傷害而不是好處 (Brinkley, 2012)。有論者指出, 外援導致了柬埔寨的援助依賴並破壞了其民主。外援在柬埔寨政治和精英

階層中創造了一種依賴文化，他們更關注於獲得援助而不是建設永續健全的經濟。外援使得腐敗得以擴大，幫助了鞏固執政黨的權力，執政者利用外援來獎勵政治忠誠和懲罰異議。外援依賴也削弱民間社會組織在監督政府、爭取民主改革方面的作用（Ear, 2013）。

對外方面，柬埔寨推動國際觀光，不只提升經濟收益，也利用遺產旅遊塑造柬埔寨文化遺產與國家認同的關聯，以及在平衡經濟發展和文化保護方面面臨的挑戰。但是遺產旅遊對柬埔寨的社會和文化發展也產生正面和負面的影響。一方面，它可以帶來經濟效益，促進文化交流和理解。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導致文化的商品化、對周圍社區與生態的壓力，以及文化真實性的流失，因為許多文化傳統，例如傳統音樂和舞蹈，已經被改編以迎合外國遊客的口味。遺產旅遊主要吸引的國際觀光客，對內方面，一些與赤柬相關的地點也被發展成旅遊景點，這牽引出對赤柬的轉型正義和解的爭議，也是後赤柬時期，柬埔寨如何面對這段記憶以建構國家認同的挑戰。例如位於金邊市中心以南約 15 公里的「萬人塚刑場」(Choeung Ek, 又名鍾屋)，是赤柬最大的殺戮場（圖 2），在這裡處死了大約 17,000 人。赤柬垮台後，鍾屋被發現了大量的墓穴，有超過 8,000 具遺骸（Kopsa, 2019）。

這些赤柬遺址如果有精心設計成對赤柬的定位與記憶，將有助於柬埔寨人藉這面對產傷痛的過去而走向光明的未來。但是洪森的特赦政策只在藉著特赦赤柬的一些領導人，前提是他們將軍隊帶回效忠國軍。即如果他們真誠改過，並為新柬埔寨貢獻力量，他們的過去不會被追究。從表面上看，洪森的特赦政策似乎成功地徹底擊垮赤柬的殘存勢力，赤柬最終於 1999 年完全瓦解。

洪森不斷指出這一成功來證明政策的合理性。但是，在柬埔寨國內，尤其是在國際人權組織中，對於赤柬的罪行缺乏任何司法解釋仍然存在相當大的不安（Linton, 2004）。洪森認為，實現和平與民族和解比對肇事者進行嚴格的司法追究和懲罰更重要。在實現了這種和解之後，他認為正確對待這個國家的創傷歷史是挖一個坑，把過去埋在裡面（Long & Reeves, 2008）。



來源：Kopsa (2019)。

圖 2：鍾屋刑場的遺跡處展現的頭顱

反而是在聯合國的推動下，才於 2006 年成立柬埔寨特別法庭 (Extraordinary Chambers in the Court of Cambodia, ECCC) 起訴赤柬的領導人，在 2022 年 9 月做出最後判決，赤柬政權的前領導人喬森潘 (Khieu Samphan) 被以種族滅絕等罪行，判處其無期徒刑。然而此特別法庭成立達 16 年之久，但最終只將 3 名赤柬領導人定罪 (Mydans, 2022)。

捌、結論

綜合以上的討論，我們發現柬埔寨的國家認同涉及了歷史、文化、社會和政治等多個領域，反映了長期與周邊社會交流和互動的歷史結果，特別是印度和東南亞其他國家文化對柬埔寨語言、宗教、藝術和建築等的影響，以及法國殖民主義和之後赤柬政權對柬埔寨身份認同都有深遠的影響。佛教不僅是宗教實踐，還是文化和社會體系，對於塑造柬埔寨價值觀、信仰和實踐有著中心作用。

檢視柬埔寨的長遠歷史到目前，我們看到兩大清楚的面貌，分別是高度的藝術展現，以及瘋狂邪惡的一面。集體記憶中夾雜這光榮偉大和恐怖統治，法國殖民讓柬埔寨人重新認知吳哥文明的偉大，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藝術遺產，是柬埔寨人最光榮的認同來源。另一方面，赤柬政權幾乎成爲大規模系統殘忍和恐怖的代名詞（Taylor, 2014）。波布想模仿毛澤東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但是走得更爲偏激，其柬埔寨零年的革命是人類歷史上少有的立即且大規模自我重新改造，並且無視因此所造成的苦難。這一時期的創傷至今仍然影響著柬埔寨的集體記憶和身份認同。

邁向全球化時代的柬埔寨，融入世界體系後重新形塑國家形象，藉著吳哥文明遺蹟向全世界招手。然而國家重建和內政的發展，並沒有跟著世界的民主自由潮流走，所以至今貪汙腐敗、專制統治依舊是柬埔寨無法更健全發展的障礙。後洪森時代能否跟上民主改革是重大關鍵，因爲民主化除了可以比較有效解決認同差異或紛爭外，也可以開創出更多元與進步的想像。如何將「一個優秀的文明，一個繁榮昌盛的民族，一個鑽石般閃耀的崇高威望」²，再次讓柬埔寨人驕傲，讓世人驚艷，不能只依賴過去，需要現在更大的努力，與更長遠未來的計畫。

² 前述憲法前言中的形容。

參考文獻

- 中華民國外交部，2023。〈柬埔寨王國〉（<https://www.mofa.gov.tw/CountryInfo.aspx?CASN=5&n=5&sms=33&s=198>）（2023/4/22）。
- 林仕祥，2022。〈「台版柬埔寨」驚全國、台灣為何成詐騙天堂？〉《遠見雜誌》（<https://www.gvm.com.tw/article/96287>）（2023/4/12）。
- 東華日報，2019。〈洪森：柬埔寨從未發生過宗教衝突〉（<https://jianhuadaily.com/20190507/52296>）（2023/5/01）。
- 紀舜傑，2021。〈泰國的國家認同〉。《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7卷4期，頁47-66。
- 紀舜傑，2022。〈緬甸的國家認同〉。《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8卷4期，頁1-19。
- 陳柔縉，2014。〈推薦序：覺醒才能終止詛咒〉收於 Joel Brinkley（楊苓雯譯）《柬埔寨：被詛咒的國度》（*Cambodia's Curse: The Modern History of a Troubled Land*）。台北：聯經（<https://www.linkingbooks.com.tw/lnb/top/9789570843699p1.aspx>）（2023/6/7）。
- 維基百科，2023b。〈真臘風土記〉（<https://zh.wikipedia.org/zh-tw/周达观>）（2023/4/22）。
- 維基百科，2023b。〈柬埔寨國旗〉（<https://zh.wikipedia.org/zh-tw/柬埔寨國旗>）（2023/4/22）。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The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Brinkley, Joel. 2012. *Cambodia's Curse: The Modern History of a Troubled Land*. New York: PublicAffairs.
- Chandler, David. 1999. *Brother Number One: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Pol Pot*. London: Routledge.
- Chandler, David. 2007. *A History of Cambodia*, 4th ed. London: Routledge.
- Clymer, Kenton. 2004.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 1969-2000: A Troubled Relationship*. London: Routledge.
- Downie, Sue., and Damien Kingsbury. 2001.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emergence of Civil Society in Cambodi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3, No. 1, pp. 43-64.
- Ear, Sophal. 2013. *Aid Dependence in Cambodia: How Foreign Assistance Undermines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Ebrahim, Shireen. 2015. "Political Psychology, Identity Politics, and Social Reconciliation in Post-Genocidal Cambodia." *Global Societies Journal*, Vol. 3, pp. 60-68.
- Groves, J. Randall. 2014. "Southeast Asian Identities: The Case of Cambodia."

-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s Review*, Vol. 70, No. 70, pp. 9-25.
- Hinton, Alexander L. 1998. "Why Did You Kill?: The Cambodian Genocide and the Dark Side of Face and Hono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7, No.1, pp. 93-122.
- Kopsa, Andy. 2019. "How Cambodia's Day of Remembrance for Genocide Victims Has Always Been Complicated by Politics." *Time*, May 20 (<https://time.com/5591061/cambodia-remembrance-day-history/>) (2023/5/1)
- Kozymka, Irena. 2014. *The Diplomacy of Culture: The Role of UNESCO in Sustaining Cultural Diversi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Linton, Suzannah. 2004. *Reconciliation in Cambodia*. Phnom Penh: Documentation Center of Cambodia.
- Long, Colin, and Keir Reeves. 2008. "Dig a Hole and Bury the Past in It: Reconciliation and the Heritage of Genocide in Cambodia," in William Logan, and Keir Reeves eds., *Places of Pain and Shame: Dealing with "Difficult Heritage"*, pp. 68-81. New York: Routledge.
- Mertha, Andrew. 2014. *Brothers in Arms: Chinese Aid to the Khmer Rouge, 1975-197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ydans, Seth. 2022. "In Cambodia, the Khmer Rouge Trials Come to an End."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9/22/world/asia/cambodia-khmer-rouge-tribunal.html>) (2023/5/2)
- Shawcross, William. 2002. *Sideshow: Kissinger, Nix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Cambodia*. New York: Cooper Square Press.
- Smith, Anthony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Nev.: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Taylor, Adam. 2014. "Why the World should not Forget Khmer Rouge and the Killing Fields of Cambodia." *Washington Post*, August 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4/08/07/why-the-world-should-not-forget-khmer-rouge-and-the-killing-fields-of-cambodia/>) (2023/4/22)
- UNESCO. 1992. "Nominations of Cultural and Natural Properties to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and List of World Heritage in Danger." World Heritage Committee, 16th session, December 7-14 (<https://whc.unesco.org/archive/repcom92.htm>) (2023/4/23)
- United Nations. 2022. "Cambodia: UN-Backed Tribunal Ends with Conviction Upheld for Last Living Khmer Rouge Leader." *UN News*, September 11 (<https://news.un.org/en/story/2022/09/1127521>) (2023/4/22)
- WIPO. 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Kingdom of Cambodia." (<https://www.wipo.int/wipolex/zh/text/491134>) (2023/5/1)

National Identity of Cambodia: Interaction between Glory and Grief

Shun-jie J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Futures Design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New Taipei, TAIWAN*

Abstract

On the common images of Cambodia, it is seen of the splendid architecture of Angkor Wat contrarily with the brutal ruling of Khmer Rouge. These two strongest images have dominated the formation of Cambodian national identity since the French coloniza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eras. The glorious historical elements gave Cambodians a source of nationalism to cope with French ruling and the Cold War politics. Just like Thailand and Burma, Buddhism also plays a big role in Cambodian nationalism. Although there is no obvious conflicts among religions, however, the sole and noble position of Buddhism still enact as a potential threat to common identity. The future challenges of Cambodia lie on the path of democratic reforms, in which 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 and elimination of severe corruption are the keys to new Cambodia.

Keywords: Angkor Civilization, Khmer Rouge, Buddhism Nationalism